

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曹小文 曹守亮

【提要】 西方社会史理论和学术话语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现阶段,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反思,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从热衷西方理论的追捧到开始注重本土化研究的学理凝练;从追求个案、专题、区域研究到微观、宏观研究并重;从注重社会史问题的研究到倾力于当代社会史理论的发掘;从学界毁誉参半到注重反思当代社会史研究,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

【关键词】 唯物史观 中国当代社会史 理论反思 学科展望

作为拨乱反正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是对“文革”时期史学界极“左”思潮的纠正。它较之传统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致力社会史研究具有诸多不同,成为中国历史学复兴最直观的象征。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近年来它成为中国学术热点的重要原因。除了具有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问题和共同研究对象外,它还有许多突出反映当代特征和社会发展的新课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指导思想,以及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和问题。这些成绩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

一、从追捧西方社会史理论到注重本土化研究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总结 20 世纪历史学的发展道路时,谈到了社会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他指出:“历史科学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 20 世纪中叶,社会学理论才逐渐取代了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945 年,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模式。”^①很显然,此论是伊格尔斯针对西方学界而发,社会学理论能否取代历史学理论似可进一步探讨,但毋庸置疑的是,这股社会学理论主导下的社会史思潮在国际史坛上产生了强大冲击力,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学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认真审视 1986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西方社会学、社会史理论其实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走向。”^②应该说,这一发展

① 杨雁斌:《世纪之交的史学盛会——“20 世纪的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览》,《国外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

②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11 页。

态势直到今天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人们的认识却在发生着新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概念的认识上。

随着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其定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一研究的理论色彩鲜明地体现在当代社会史定义的构建与反思等方面。以现有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积累,若要对当代社会史下一定义很可能要借助于西方理论,而对西方各种理论流派的吸收和借鉴就构成了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各种流行观点。各种观点学说的争鸣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研究路径的反省:“真正要揭示社会史的学科意义和价值,不能拘泥于定义,或者说主要不能拘泥于‘定义先行’的原则,而应该深入到活跃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追踪其出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其客观存在的历史实相探寻出它的历史必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学科地位。”^①这种摒弃“定义先行”,深入当代社会史研究实际的做法,有力推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既然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那么中国当代社会史则是研究1949年10月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总体史。^②这些观点小心翼翼地将当代社会史界定为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剔除了政府和特殊人士,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所受“国家与社会”解释范式的影响。这表面上看来是如何对待社会史及其定义问题,实际上暴露出的更深层次的是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如何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须知,当前社会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出现的对历史与理论关系所形成的颠倒认识,正是该学科广为诟病的重要原因所在。

“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模式包含国家与社会、官府与民间、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核心概念,它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很多学者在积极运用的同时,也进行了理性反思。如果能够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整体出发,发掘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所掩盖的“多重互动关系”,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模式,同时又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论域”,^③“而不是简单在用语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套用一切,用大而化之的框架掩盖论证分析的粗疏无力”。^④这至少能够给我们带来如下两点启示:(1)对于西方理论的借鉴,绝非仅仅了解理论本身就能完全运用自如的,还需要了解理论的发展演变,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乃至相关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不仅要了解“毛”,还要了解生长出“毛”本身的“皮”。(2)还需要借鉴者对所要研究的中国问题作一番评估,分析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否真正能够适用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而不是简单、机械、生硬地套用。

从对当代社会史定义、“国家与社会”研究路径及其理论来源的认识可以看出,从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引介、借用到对相关概念的批评反思,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史发展的缩影。这种反思的直接表现就是,许多学者力避对西方理论简单嫁接,努力从中国历史中提炼问题意识和阐释模式,以建构本土化的学术理论,^⑤以至“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概念”。^⑥这种要求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社会史

① 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前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 李金铮:《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③ 邓京力:《社会理论与社会史——“国家与社会”理论解释框架的范式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增刊。

④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页。

⑤ 邓宏琴:《走向田野与社会: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史林》2008年第6期。

⑥ 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研究中的“本土化”趋向,抑或说是民族化意识的觉醒。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本土化”意识已经成为当前研究者的共识和众多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① 这种理论的自觉反省反映到具体研究实践中,引发对本土化研究路径的探索,从而促进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作了如下的归纳:(1)社会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2)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3)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4)社会史理论的三个讨论问题;(5)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②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对待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是对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本土化理论”问题的探索性回答。倡导从研究实践中总结和提升社会史的概念,是当代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重要表现。

二、从个案、专题、区域研究到微观、宏观研究并重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史研究与经济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把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倡导把经济史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社会史研究内容的变化,标志着史学研究理念的重要转换。何兹全在讲到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史发展趋向时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③ 何兹全所论有三点不应忽视:第一,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标,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指导思想、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转变。第二,在指导思想方面,如果说此前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话,此后社会史研究则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社会史理论的影响。第三,从研究对象看,此前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等宏观研究对象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衣食住行想、吃喝拉撒睡等微观研究命题。应该说,指导思想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研究旨趣和研究对象的变化,鲜明地体现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抑或说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对这一变化的体验更为敏感。

21 世纪以来,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并重逐渐成为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旨归,产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王义祥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分别从人口、婚姻家庭、社会阶层、农村社会、城市社会、政治结构、经济体制、思想文化、教育体制、社会心理、生活方式、转型期的社会问题等领域,详细阐述了 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可以看作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尝试之作。2007 年,李洪河的《新中国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一书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又一尝试,在相当程度上实践了作者将“社会置于学术研究的注目中心”^④的研究旨趣。2008 年,高华撰写的《小人物,大历史》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15 页。

② 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目录页。

③ 何兹全:《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3 页。

④ 参见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绪论》,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 页。

一文也可看作当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得比较好的文章,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考量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① 2010年8月,王瑞芳出版了《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一书,逆当前社会史研究的小、微、碎倾向,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将目光集中于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上,尤其是集中于土改前后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上”,^②在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探索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201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的“全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维护民族团结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和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等节,宏观视野与微观具体研究相结合,对当代社会史作了催人奋进的阐述。

社会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结合逐渐受到重视,愈益成为党史和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像有的学者将中国当代社会史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归咎于过多依赖“1949年前后形成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导下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的框架”。这种主观上“超越已有的革命史、党史和国史解释体系”^③的企图,似乎是想推动当代社会史研究发生研究范式转变,但造成孤立的、断片式的微观研究的弊端影响逐渐凸显。从社会史的研究视角看,社会史学则试图在克服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缺点和不足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去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从而使之“既见树木,又见森林”。^④ 有学者把这一研究领域称为“经济—社会史”。^⑤ 这似乎又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家最初涉足的社会经济史领域,似可看作研究对象和研究旨趣的回归。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理路,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昭示着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还出现过以社会史的方法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想法。^⑥ 2011年12月,张静如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在走向深入。该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整体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以新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为骨架和脉络,将人口家庭、社会组织、阶级阶层等社会主体的变动,社会结构、社会保障和社会问题的变迁,以及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化编次论述,是宏观社会史编纂的一次有益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张静如还提出,当代社会史与国史在研究对象上的同一性,所不同的仅仅是取舍、重点和结构不同而已。当代社会史各个部分、领域的平衡性与国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生活的点缀性构成了两者最为明显且最为根本的区别。^⑦ 这表明《中国当代社会史》与一般意义上的当代社会史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至少在编纂者主观意图上,它已

① 参见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323页。

② 王瑞芳:《土地制度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③ 行龙:《“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杨学新主编:《起步与拓荒: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4页。

④ 本书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⑤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此后,该杂志每年出版一本,在刊登西方经济—社会史问题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刊登了一些如黄敏兰撰写的《我所经历的陕北农村生活》、卜凤贤的《中西灾荒史:频度及影响之比较》,以及齐世荣的《1958年高校大跃进》等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

⑥ 郭德宏:《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⑦ 参见张静如:《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

经是试图反映新中国六十多年历史变迁的整体史论著了。这似乎预示着当代社会史研究向唯物史观旨趣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路的回归。

三、从注重社会史问题到当代社会史理论的发掘

在国外众多有影响的理论中,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较大。在一些人看来,“历史是什么”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通过怎样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统领历史材料或串联历史事实……政治倾向十分明显。^①从当代社会史研究路径的建构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不可避免地受到学者的关注,其理论探讨更多的是借助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理论。台湾学者批评中国史著“仅是西学的派生物,其解释理论概由西方转手而致,因此鲜有特色与创意可言”。^②此论或许责之过严,但用于警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至为恰当。而同时,“主张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研究下层平民百姓的历史,成了研究者们相互切磋交流的‘绿色通道’”。^③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路径的探索就自然而然地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当代社会史上发掘得比较充分的理论命题。在研究者视野中,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史术语。2009年,“革命与日常: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标志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诞生”。^④2011年,《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出版,将“集体化时代”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当代妇女史研究是一个探索新的学术研究路径的新尝试。近十年来,中国的当代妇女史研究也日益兴盛,一方面由于它的“基础性”地位,在新兴的妇女学科里受到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历史性”特点,在传统的历史学科中也备受以男性为主导的研究者的青睐。这两股力量的汇合给当代中国的妇女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同时也为人们从多个不同的侧面认识妇女提供了重要渠道。^⑤当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妇女史研究格外引人注目,成绩突出。这方面论著主要有:高小贤的《“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汤水清的《从社会解放到自我解放:60年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和刘维芳的《新中国妇女地位的历史巨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等文紧扣时代脉搏,发掘了当代妇女的历史作用。

“区域社会史”理论在当代社会史研究者中引起了热烈的探讨,其中以山西、华北、华南等区域的

① 畅引婷:《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8日。

②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③ 田居俭:《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3月5日。

④ 邓宏琴:《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1期。

⑤ 畅引婷:《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8日。

研究最为充分。学界推出了诸如《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石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金大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赵世瑜,三联书店2006年版)、《新编地方志与当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王胜,《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行龙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理论成果。“区域社会史”这一研究路径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方式,更加强调对区域的全方位考察,在揭示自然和人文社会整体状况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历史命题。^① 区域社会史理论对于展现同一当代社会政策下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当代社会史理论研究的深化进一步推动了当代社会史内涵的研讨。例如,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为主线,以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建和专题研究相结合,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全面考察当代中国社会。^② 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是研究新中国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③ 还有的学者指出,当代社会史研究要以国史的主流作为宏观背景,阐释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的着力点要紧扣国史研究的重点和主线来展开,为凸显国史的通史性特点、呈现国史的全貌服务。^④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以当代社会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为主线,应围绕当代社会基本问题而展开,应以探究当代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⑤ 这些观点的提出,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引起了讨论。尽管这些具体观点还处于进一步的争鸣和深化认识当中,但讨论本身就说明了研究者对当代社会史研究路径建构意识的日益凸显。这反映了作为学科体系基础的路径研究和学科构建意识正逐渐进入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视野中,引起他们的研究兴趣。

四、反思当代社会史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形成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和一些学术增长点、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研究成果可观,以及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方面的尝试,而且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也已达到一个稳步发展阶段,改塑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⑥ 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重要表现,而且还成了当代中国史学的主要趋势,有取代马克思主义学派地位之势,^⑦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史学

① 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参见李文:《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

③ 朱佳木:《努力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④ 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⑤ 朱汉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

⑥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⑦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8页。

的基本结构和面貌”，“竟然成为新时期史学演进的主流方向”。^① 这种观点貌似将社会史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部分，实质是仍然将两者对立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代社会史受西方学术话语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当代社会史研究并没有取得与其地位相称的成果。这些评价不可谓不高，用在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评价上是否恰当，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因为学界一直存在社会史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论，认为当代社会史研究没有发挥上述作用，甚至支持社会史学不能成立的学者也大有人在。^② 现阶段，当代社会史作为一种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时段、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专门史，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就整个当代社会史的丰富内容来看，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处于草创阶段。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和完善的地方。

首先，过度社会科学化，导致了许多优秀史学传统丢失，历史学主体地位和本质属性受到冲击。有研究者曾批评社会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尽管当代社会史研究选题和研究视野都大大缩小了，也尽可能地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但仍然很难摆脱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弊端。^③ 这种弊端并不完全是社会史研究所固有，而是由于过多地依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念、理论与方法将当代社会史生硬肢解所致。这种过度社会化的倾向过多地强调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借鉴理论与方法，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了特定的时空领域和历史场景，甚至改变了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原本属于史学的思维结构和认知方式。^④ 而忽略了历史中所蕴含着的生命气质，也就得不到历史的精神实质，仅仅解剖社会的躯体则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初衷。须知历史是生命的，是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有机统一。这也正是时下学者倡导的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加强生命叙事、情感体验、价值考索的重要原因所在。^⑤

其次，当代社会史研究选题的小微倾向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狭隘化，造成专业化程度加深和研究成果碎化，受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深远。历史研究论文中所充斥的公式、图表、模型和数据不仅让一般的读者望而却步，而且即使是不同研究方向的专业学者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感觉。“画地为牢”的研究偏执表面上看来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细化、碎化，实质上凸显了研究者对学科整合、综合研究的排拒。当代社会史研究也极可能因此更加脱离大众，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这种所谓的“碎片化”不仅因忽视了理论，陷于支离破碎而无法找到问题中心，^⑥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所受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冲击。目前学界一些人所推崇的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以及纳塔莉辑蒙·戴维斯所著的《马丁·溢尔的归来》等著作，同时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典范之作。在笔者看来，尽管不少学者在谈到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时候，会追溯到法

① 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前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② 参见张乃和：《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兼论历史学分文科学社会史学能否成立》，《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一个时期以来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以张村、赵庄、王寨，以及M村、L村，乃至用×××略去具体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对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来说有特殊意义，但对于当代社会史来说却是不足取的。抹杀了历史学个性的研究很可能既得不到历史事实之真，也丢失了历史现象之丰富多彩。

④ 李忠人：《“否定之否定”：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探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⑤ 姚力：《试论口述历史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启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⑥ 郑清坡：《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念》，《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

国年鉴学派这一源头,但从学界研究成果所展现出来的实际情况看,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微观史学的研究路向。因为他们在其琐碎、孤立的微观研究中,往往“忘记”了以小见大的研究旨趣,或者是只进行了其申明研究中的第一步:碎片化研究。因此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应当引起充分关注和深刻反省。

再次,当代社会史研究对宏观史的疏离和放逐,造成研究中出现许多人为的割裂,消弭了历史意义和价值求索。当代社会史研究往往注重个案分析、调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增加了造成历史研究中“孤证不信”现象出现的可能性,更增大了理论提炼和规律抽象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一种新的偏向也在产生,这就是只注意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现象的描述,忽视对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史与经济史的一种背离”。^①这种背离,在笔者看来,具体表现为研究中的割裂、单调、狭隘,在研究方法上则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偏执。“亦有学者把社会史仅仅理解为社会生活史,以为社会史只应该研究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表象,把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同宏大历史环境和事件隔绝开来……但如果只满足于罗列或者捡拾一些历史碎片,也决不能触摸到历史的本质。”^②社会的有机性决定了众多个体研究成果的简单相加并不一定得出对特定时期社会的整体看法。个案真相的求索、考证得出的只是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历史知识之真”(历史事实),而要想真正求得“历史发展之真”(历史规律),^③还是必须在宏观研究上下一番苦功夫,“逐渐形成底层与上层史态间的清晰关联”,^④避免出现“许多个案的、琐碎的研究无关宏旨”,陷入“无意义境”。^⑤

最后,当代社会史研究过多地注重个案的考索,一方面津津乐道于个案事件和区域历史中所透析出的底层权力运作,另一方面却又通常排斥对传统政治史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狭隘的乡土情结、自恋倾向。正如社会史中的现代化研究很难避免造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历史研究过多地关注地方、民众以及基层政权很难避免基层与中央、民众与政府、局部与整体的对立趋向,这使得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打了折扣。抑或过多地强调历史文化中的异质因素,恐怕对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民族精神的培养等工作带来负面效应。因而,这也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从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来看,当代社会史很难绕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究竟如何?当前政治史研究领域的基层化、底层化、微观化的研究倾向,以及心理体验和情感价值分析等研究视角,事实上也模糊了诸多学者对当代社会史的定义,冲击了当代社会史学科建设的自信心。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社会史学科

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的学术冲动在学界一直非常强烈。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在向纵深发

① 李根蟠:《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② 李文海:《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

③ 侯云灏:《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④ 江沛:《以社会史视野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⑤ 张济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如何进行》,《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展,并逐渐形成多学科、多角度的学术对话”,^①并且迈出了“专题性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探索性步伐”。^②“无论是从社会史中心议题的深入研讨,还是从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来看,社会史仍然展示出诱人的发展前景。而社会史的发展又始终与其特有的学术关怀与强烈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③本土化和民族化特质是中国当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孜孜以求的长远目标,也是其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当代社会史研究学科建设成为“既有独特的客观存在实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又有准确规范的概念,完整清晰的研究范围,各层次、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④的学科是当代学人的共同学术追求。现阶段,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社会史学科问题上展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自觉性。这主要表现在:

从指导思想上看,坚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指导,以及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参照,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从当前当代社会史研究暴露出的弊端看,其病根在于指导思想的零散而不成体系,有一些甚至是从本质上反理论、反体系的。当代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引介和借鉴西方社会史研究理论,还是借用各个学科的理论,乃至是所谓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口述方法,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是如何解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如何架构、整合微观研究与宏观整体研究之间时隐时现的理论空缺、如何评述个体的情感乃至情绪体验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代价问题。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倡导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以改变以往史学那种苍白干瘪的形象。^⑤具体到对当代社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反思,一些著名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何兹全明确提出:“我也不反对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因为它的理论、方法有些也符合辩证法。但我认为研究社会史的主要理论、方法应当是辩证唯物史观。”^⑥较早倡导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田居俭指出,要想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体系的当代社会史,避免唯西方社会史研究马首是瞻,生吞活剥别人的理论、方法以至话语,错走食洋不化的弯路,要择善而从,为我所用。就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的社会建设作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题和主线”。^⑦在这里,田居俭不仅提出了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找到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题和主线,进而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找到了抓手。李文海在谈到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倡导一个观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指导。^⑧以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社会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这既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超越,与其说是史观

① 李小尉、朱汉国:《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② 行龙:《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③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④ 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总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⑤ 田居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⑥ 何兹全:《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页。

⑦ 田居俭:《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3月5日。

⑧ 李文海:《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

的转型,不如说是对唯物史观这一思想资源的重新确认和积极构建。

从研究视野上看,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致力于整体史研究的目标和追求。既着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又全面展示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而不是把经济史导向脱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研究的方向。^①何兹全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值得关注:“我不反对社会史研究要包括社会生活、宗教、家庭、风俗习惯等等,但我认为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应该是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②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似乎可以稍微宽泛一点,研究社会形态、社会发展史当然应该算作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但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领域却应该从整体和宏观着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本、物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对气候、生态、疾病、毒品、恐怖等问题的应对,愈来愈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把当代社会史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尤其是互动关系的研究,成为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地方史、区域史研究中的全球化色彩也日益浓厚,成为史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由此,中国当代史研究所具有的“从单纯的民族—国家立场转向了对民众生活质量的评判!对不同国家及区域联系的重视和对人类共同发展路径的思考”^③研究趋势,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是具有启示和影响的。

从研究内容上看,当代社会史研究要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存在前提、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还要考察“不同时期解决社会矛盾的成败得失,梳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始末”。^④其核心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⑤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和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所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为当代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一条值得坚持的正确道路。总体上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政存史,服务当世,并直面和研究当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都为当代社会史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土壤”。^⑥这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鲜明的发展趋势,也是与国外社会史研究突出的不同点。

从基础史料的开掘与运用看,当代社会史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基层档案的重要性,并且做了一些抢救工作,产生了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当代村级档案资料与明清时期的资料相比有着同样的价值,^⑦由于体制改革与城镇化发展,不少机关、学校、企业、家族在兴衰、并转过程中废弃了大量档案资料,这些史料的价值同样值得重视。因为这些基层档案所反映的是中国农村基本制度、生活状况、精神世界、公众生活的变迁,反映的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农村社会的运作。这些史料与来自上级部门直至中央的政策、制度、法律,以及当代口述史所形成的资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共

① 李根蟠:《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应在继承中发展》,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② 何兹全:《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页。

③ 江沛:《以社会史的视野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④ 田居俭:《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研究亟待拓展的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3月5日。

⑤ 朱汉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主持人语》,《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⑥ 冯军旗:《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5日。

⑦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自序》,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6页。

同构成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三大基础史料来源,推动了一场新的“资料革命”。^①

从研究方法上看,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视角实践调查研究。翦伯赞在20世纪50年代就运用实地考察的调研方法对民族关系展开调查,并撰写出社会史方面的文章。傅衣凌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法来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史。从社会史的视角加以分析,“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②这种调查,尤其是其中的集体调查法,更能体现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丰富多彩。田居俭则指出:“研究社会史,特别是当代社会史,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事社会调查,或就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进行专题调查,获救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进行理论升华。”^③这表明,社会调查法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不仅应该受到重视,而且还应该在正确立场上进行。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门新兴学科,空白点多,尚在起步阶段,厘清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学科构架,非常必要。^④作为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一部分的当代社会史无法承载史学属性的全部功能,更无法体会出史学特质和风貌。纵观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90年代的放逐流浪之后,新世纪新阶段在西方强势学术话语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再次经历了自我主体的迷失和史学视角的重建。时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处于新一轮的问题盘点与学术整合时期。这是当代社会史研究能否凝练出具有更强学术阐释力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理论的关键时期。“当代社会史是什么”的学术追问将引领着人们在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展现出应有的思辨色彩与理论品格。而对当代社会史学术发展历程研究(即学术史研究)的缺失和对既有的社会史研究范式的简单摒弃,则是直接导致该学科历史学属性丢失、民族性特征缺位的两大重要原因,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热衷于碎化求真、西化求新和排拒理论凝练的间接原因。重视这两大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开展无疑将为当代社会史健康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敏锐的学术批判力以及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否可以认为是为中国当代史学,很可能也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术增长点。

(作者曹小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邮编:100089;

曹守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9)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王旭东)

① 行龙:《“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杨学新主编:《起步与拓荒: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②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4页。

③ 田居俭:《党史研究者要关注社会史研究》,《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④ 周群:《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5日。

SUMMARY OF ARTICL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Cao Xiaowen, Cao Shouliang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social history and academic discourse not only play positive roles but also bring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ies. At this stage, studies of China's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began to reflect and explore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re have been some new trends: from the hot pursuit of western theory to the focus on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localization of promotion,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case, area studies to Microscopic study, Macroscopic study, from the specific social history issues to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path construction, from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to conscious self-reflection and proper positio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ontemporary social history.

Thinking on the State of Early Medieval Europe//Hou Shudong

Many medievalists have been concerning about the state of early medieval Europe in recent studies. They have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the early medieval kingdoms, and generally rejected to see the early medieval kingdo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chotomous categories (for example,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etc.). They think that it is a mistake to understand the kingdoms of early medieval Europe as a premature form of the nation state or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emphasize that the early medieval kingdoms should be understood on their own terms. In doing so, they turn down the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The Future of a very Old Name? On the History of Presentism//Francois Hartog

During the last two centuries, the word History has been one of the “crossroad” terms around which belief crystalized itself. But what do we mean when we utter the word History today? What do we (still) believe in? We could look at the question both from inside the discipline and from outside.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the proposals? In any case, we must start by abandoning the prior meaning of the term: That modern notion of history written with a capital H which was launched and imposed by Europe and was charged with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s; which wanted to be, simultaneously, the locative of the modern world as well as its ultimate judge. That notion of history may still linger on, but it no longer holds sway on